一五一十周刊
NO.114
2013年7月12日

包修平 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 | 张洁平 埃及："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 |
何清涟 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如何理解埃及二次革命

编者的话

时隔两年，埃及人民又回到了广场上。在那里，他们曾经呼喊过民主、自由，并要求统治埃及三十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两年后，口号没变，反对对象变成了他们选出的、上任不到一年的总统穆尔西。一周多来，这场原本被理解为政权和平交接的“二次革命”，在事后的清算和暴力流血冲突中有了一丝“政变”的味道。如何理解此次革命？这是民主制度的失败吗？埃及的民主转型去向何方？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埃及的两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的过程复杂，我们综合纽约时报、路透社、BBC 以及维基百科的内容制作了两次革命的时间轴，梳理了这两年来埃及政界的大事件，试图展现埃及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埃及语境，我们也加注了对事件相关方的背景介绍。自由派、军方、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美国等国际援助……革命后的埃及并非一面倒的民主改革，更多是各方势力反复博弈微妙的过程。

包修平博士在《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一文中简明扼要地指出，革命的再次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执政党执政表现不尽人意，反对派的操作以及军方的介入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认为一场革命并不是当下民主转型中的埃及社会所需要的，“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而非子弹”。托马斯 · 弗里德曼则认为，在目前慢慢变得两极分化的埃及社会，实现民主化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政府，包括军方在内的主要政治参与者都要达成民主共识，仅有让现任总统下台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学者何清涟则从民选政府执政表现的角度入手谈了埃及革命对中国的启发，她认为“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解决经济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机遇，要分清民主化之能与不能”，不能因为埃及民主化的挫折就否定这一政治制度。

在军事、宗教等势力之前，站在广场上呐喊的都是谁呢？广场革命我们并不陌生，但如何完成社会失序之后的过渡转型呢？记者陈婉容认为，“永远的

广场起义智慧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另一名记者张洁平曾到访一次革命后的埃及，收集人们口中的解放广场，和一个个个体的革命故事，她说“埃及是一个世界，Tahrir（解放广场）是另一个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努力，是把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公民社会缺失”这一论断成为我们在反思广场革命时屡屡提及的词，而这一带着强烈西方烙印的词，在文化、宗教完全不同的非洲国家埃及，是否适用呢？对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议题，王林聪研究员的《埃及公民社会刍议》做了切实的探讨。

1510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编者的话 2
【状】 5
9-1 埃及政权交接：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 5
【析】 12
9-2 包修平：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 12
9-3 托马斯·L·弗里德曼：埃及的“二次革命” 16
9-4 何清涟： 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19
【评】 23
9-5 陈婉容：民主路长：埃及政变——不断重复的广场革命 23
9-6 张洁平：埃及：“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 26
9-7 王林聪：埃及公民社会刍议 35
【思】 42
9-8 张翠容：私有化的迷思——-从戴卓尔夫人逝世说起 42
9-9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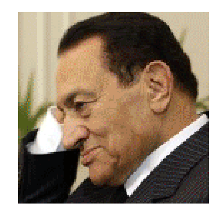





【状】

9-1 埃及政权交接：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





2011年2月11日

在民众反对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持续18天后，担任埃及总统30年的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2011年2月14日

埃及军方设定6个月内起草宪法并选举新届政府的时间表。

注1：埃及军方



埃及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常备军，估计有45万名军人，多数是应征士兵和几乎没有晋升可能的低级军官。但几十年来，数万名精英军官小心翼翼地保卫着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像一个独立的阶层那样生活着，有自己的社交俱乐部、宾馆、医院、公园以及其他由国家买单的福利。许多人还凭借自己的地位得到政府合同和商业交易，借此致富。大家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交圈里。“他们往往想法一致，他们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因为除兄弟会以外，他们是埃及唯一真正具有凝聚力的机构。”“他们不喜欢充当一线演员，不喜欢充当警察，”他说，“他们主要只希望局势稳定下来。”



2011年11月30日

废黜穆巴拉克以来的首届议会选举举行。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的主流伊斯兰团体赢得了大约40%选票。其后两年，由于政局不稳，埃及旅游业下滑惨重。



注2：穆斯林兄弟会

以伊斯兰逊尼派传统为主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他们的目标在于让《可兰经》与圣行，成为伊斯兰家庭与国家最主要的核心价值。1928年出现在埃及，由一名学校教师哈桑·班纳发起。穆兄会初期作为宗教性社会团体，除践行伊斯兰教外，还设立了教育和医疗机构。但自影响力扩大后的1936年来，组织成为了近代伊斯兰世界出现最早的政治团体，开始反对英帝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他们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形成一股风潮，扩散到许多伊斯兰国家，形成他们国家中最大的政治反对团体。





注3：自由与正义党

埃及的一个伊斯兰政党。该党由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于2011年4月组建而成，目前是埃及影响力最大的政党，埃及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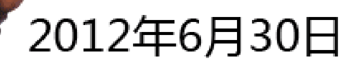
注4：旅游业在埃及的重要地位

旅游业直接提供了接近300万人的工作，为埃及提供了20%的外汇，是埃及第一大重要产业。



2012年6月15日

总统选举前夜，埃及军方统治者采取行动巩固扩张权力，他们根据当时一天前的法院裁决关闭了穆斯林领导的议会，并掌握了即使在新任总统就职后也有效的唯一的立法权。他们的权力给予他们对所有法律和国家预算的控制，对所有监督的赦免，和对宣战的否决。军事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一个临时宪法，用明显的手段几乎完全消除了总统的权力，以遏制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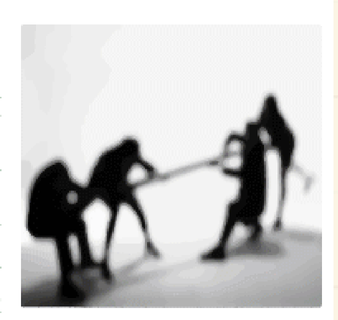
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成为了埃及第一次竞争性的总统选举的获胜者，给予穆斯林一次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胜利和与国家最高将领们争夺权力的有力武器。

2012年7月

军方和总统间权力斗争升级。穆斯林兄弟会和军方之间的斗争在穆尔西召回将军们在匆忙的法院裁决后解散的民选议会后升级。埃及的最高法院和将军们否决了此命令，但议会置之不理并进行会议投票上诉法院的决定。这造成了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矛盾的混乱。



2012年8月12日



穆尔西驱赶军方首领并掌握权力。穆尔西强迫他的国防部长，军队总参谋以及其他高级将领退休。穆尔西还宣布军方在他就职之前的宪法宣言无效，此宪法宣言曾夺取了总统的权力。他取而代之以自己的宣言，此宣言给予他广泛的立法和司法权力，并潜在地给予了他在起草未完成的新宪法中的决定性地位。

2012年11月22日

穆尔西掌握新的权力。随着制宪会议处于崩溃边缘以及抗议者因变革的缓慢而与警察发生街头冲突，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发布一条法令，给予他作为埃及革命的卫士的高于任何法庭的权力，并使用他的新权力命令对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再审。

2012年11月29日



尽管存在反对，埃及穆斯林通过宪法草案。由穆斯林起草的埃及新宪法经投票通过了被人权组织和国际专家指责充满漏洞和模糊的一章。通过的结果将满足一些革命的中心需求。但同时它也会给予将军们自穆巴拉克时代就享有的过多的权力和特权，并且会拒绝了极端保守的沙拉菲的需求。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民众聚集在解放广场抗议穆尔西膨胀的新权力。

2013年3月



埃及挣扎复苏艰难经济状况。燃油的短缺使得食品价格飞涨。甚至在夏天之前就开始出现停电。并且埃及正在艰难地偿还数十亿美元对外国石油公司的欠款。数个月以来，埃及政府在就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8亿美元条件较简单的贷款进行谈判。他们的思路是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贷款，那将会给埃及政府提供足够的信用以撬动更多的援助和贷款。但若此交易达成，那很可能意味着缩减对能源的补助，这恐怕将激起民众的不满。四月，埃及就增加贷款规模施压，但讨论被搁置并且将在十月才重开。



数百万名埃及民众寻求驱逐穆尔西。在对穆尔西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的政治强势倾泄而出的愤怒中，数百万埃及民众涌向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要求驱逐穆尔西。示威者纵火焚烧位于开罗的穆尔西在穆斯林兄弟会运动中的总部。穆尔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在数个城市中发生冲突，导致至少七人丧生。示威游行的规模似乎甚至超过了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统治时的大规模街头游行。

2013年7月1日

军方向穆尔西下达最后通牒。在一份电视声明中，埃及军方首领塞西将军威胁军方将干预埃及的政治危机，警告穆尔西和其他的政客称他们有48个小时回应铺天盖地的示威，包括穆尔西辞职的要求。塞西将军表示如果穆尔西不采取步骤以处理对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的要求，军队将采取强制行动以实现他们“自己的对未来的道路”。

2013年7月3日



军方驱逐埃及总统；穆尔西谴责其为军事政变。在一份电视声明中，埃及国防部长塞西宣布驱逐穆尔西，埃及第一任经自由选举的总统，中止宪法，成立临时政府并坚称此举是对数百万反对穆尔西及其穆斯林兄弟会同僚的穆斯林议程的埃及民众的回应。穆尔西所拒绝的军方干预让人们产生疑问，质疑2011年的革命是否能够兑现其在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建立新的民主政权的承诺。

临时总统宣誓就职。阿兹利•曼苏尔，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与此同时，保安部队将穆尔西关押在未经透露且与外界断绝联系的处所；穆斯林的广播渠道被关闭；检察官寻求逮捕数百名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同僚，迹象表明他们在埃及最近的政治震动中可能承受最大的损失。

2013年7月8日

多名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示威中被杀。在外界认为穆尔西被关押的处所之外，军方和警察向数百名穆尔西支持者开火，至少有5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多名目击者宣称此次攻击并非由示威者挑起的。与之相反，一位军方发言人则表示，暴力冲突是由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袭击埃及共和卫队所引发。这是自穆巴拉克被驱逐之前以来最为血腥的暴力冲突。

2013年7月9日

临时政府寻求尽快选举。为了向埃及民众和世界保证其回归民主的意图，军方领导的临时政府列出了一个粗略的时间表，计划在将来六个月内彻底修正一度中止的宪法，选举出新的议会和新的总统。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华盛顿官员将埃及将军们对政府的接管认作政变，或认定开罗正在离民主渐行渐远，那么埃及军方将损失约13亿美元每年的美国援助。

【回到目录】



【析】

9-2 包修平：如何看待埃及的二次革命？

包修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中心」IAIS 博士生

“

一国在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失败者的一方扮演破坏者角色。这种破坏者对于民主转型非常危险，有可能朝向不可收拾的结果。在今日透过街头暴力获得政治利益的情势已经出现，但这种策略不允许发生在民主转型的埃及社会中。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Ballot)，而非子弹(Bullets)。

”

埃及前总统穆尔西(Morsi)于 6 月 30 日执政满 1 周年，然而这 1 年来没有满足民众期待。治安的败坏、失业率高居不下、能源短缺与物价高涨等经济问题，导致大规模群众涌入街头，呼喊穆尔西总统下台。穆尔西与其所属团体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则不断捍卫其民选合法性。但随着军方表态，局势瞬息万变。7 月 3 日军方宣告免除穆尔西总统一职，并终止新宪法的进程。外界视军方介入为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但另一方面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群众却欢声雷动，视军方为人民救星，在广场上彻夜庆祝狂欢。

笔者发现台湾媒体对埃及革命报导过于简化，一说穆尔西团队企图将埃及伊斯兰化，建立“神权”国度，严重影响民主价值。另外则是强调埃及世俗主义(Secularism)与伊斯兰主义(Islamism)的抗衡。事实上穆尔西政府的倒台并非如此单纯。一味地指称穆尔西与穆斯林兄弟会要建立不宽容的神权国度，似乎陷入了“东方主义”论述的困境。

笔者将根据当前研究埃及专家学者们的文献，试图分析这次埃及二次革命的现象，以及未来埃及所面临的挑战。

1.为何再度爆发革命?

简单地说，埃及二次革命的三大成功要素：人民的不满、反对派系(Tamarod)的运作与军方介入。若三者缺一，穆尔西总统未必能倒台。



先说人民因素，经济困境是这次大规模群众走向街头的主要动机。这1年来，穆尔西总统虽力图改善经济问题，如取缔黑市、增加农作物生产、协助农民免除债务以及扩建公共设施。（注1）然而在长期贪腐与缺乏法治的环境下，穆尔西总统的经济计划失灵。此外埃及面临能源短缺、原物料大涨与长期失业率等问题，当初投票给穆尔西的选民，随者经济恶化，从期望转变成失望。6月30日大规模群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经济问题则是最主要因素。

从反对派系来看，一般外界解读成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与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s)的对立。某方面的确可以这么分析。在去年穆尔西上台仅2个月后，部分反对人士已经计划让穆尔西难堪，策划迫使其离开总统职位。但今日的反对阵营是个相当松散的团体，意识形态分歧，如穆巴拉克时期的前朝旧臣、左派人士、伊斯兰主义者以及独立知识分子都在其中，使他们聚在一起的唯一共识是藉由群众力量迫使总统穆尔西下台。

最后则是军方势力。军方是反对派中力量最强的团体。若军方不出手，穆尔西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倒台。军方是埃及最大的利益团体，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从1979年以来，美国每年以13亿美金援助埃及军方。过去30年来，埃及军方虽声称他们没有政治企图，不过却掌控国家百分之40的经济资产，经营许多企业与不动产等商业行动。（注2）埃及二次革命不会为埃及带来正面改变，军方虽说是反对者救星，但不可否认埃及长期经济贪腐与政治堕落，埃及军方也参与其中。此外，美国政府为了中东区域安全与利益考虑，不太可能让埃及军方放弃既有特权。

2.反对派对穆尔西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指控

反对派系表示穆尔西企图将埃及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国度，如去年经由公投通过的新宪法带有浓浓的宗教色彩，未来将压迫基督教与自由派人士。

这个论述在西方媒体报导上也随处可见，也许某种程度反映反对者对穆尔西的疑虑，尤其穆尔西出身于穆斯林兄弟会这个伊斯兰运动组织。该组织过去以反英国殖民统治起家，早期强调建立“伊斯兰秩序”的重要性。然而西方媒体却很少报导当前穆斯林兄弟会如何看待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价值。在一篇访问前总统穆尔西的文章中，他谈到民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提及女性地位、少数族群、新宪法制定、经济投资与对外关系等议题。

访谈中，穆尔西谈到公民国家(Civil State)概念。如2001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学者（包含世俗主义者）签署一份声明。该声明拒绝伊斯兰国家的理念。未来埃及将是个公民国家，一个现代化、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同时他也谈到外界对新宪法的批评。他说宪法制定的原则是不歧视任何少数宗教团体，同时保障所有埃及人民权利。 （注3）



西方媒体或是反对派人士将埃及新宪法解读成穆斯林兄弟会的宪法，但根据学者研究，事情似乎不是如此。如新宪法最争议的第 2 条草案："伊斯兰是国家的宗教，阿拉伯文是国家官方语言。伊斯兰原则是立法来源。"宪法中最争议的一点在于"伊斯兰原则是立法来源"这个措辞，但在 1971 年制定的埃及宪法第 2 条也是相同措辞，因此反对派使用这个理由攻击穆斯林兄弟会似乎仍有讨论空间。（注 4）

一位研究埃及新宪法的法国学者表示，伊斯兰在新宪法的角色其实仍是象征意义。当前埃及社会多数人民仍是虔诚的穆斯林，将礼拜、天课与封斋等宗教义务视为生活重心。只不过政治人物藉由操弄伊斯兰与新宪法关系以及其简化论述，造成社会舆论的激辩与不安。（注 5）

3.反对者角色与民主转型困境

埃及学者 Omar Ashour 的一篇文章表示，埃及现势相当复杂，不只是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的政治斗争。事实上在二次革命前，比穆斯林兄弟会更为保守的伊斯兰政党，光明党(Salafi Nour)，其政治人物打破不与非伊斯兰政党合作的惯例，转为支持所谓的自由派，制衡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到现在仍动荡不止的原因，Ashour 提出三点理由。

革命之后的埃及，人民对于前景过于期待是第一个理由。但随着经济持续低迷、治安恶化、物资匮乏与街头的混乱局面，革命时的口号"面包、自由、社会正义与尊严"已难以实践。第二，由穆尔西领导的执政团队缺乏经验，无法有效管理革命后的埃及社会，同时难以安抚反对派系的不满与敌视。

至于最后一点原因，Ashour 利用史丹佛大学政治学学者 Stephen Stedman 的"破坏者"(Spolier)理论。该理论指出一国在进入民主转型时期，失败者的一方扮演破坏者角色。这种破坏者对于民主转型是非常危险，有可能朝向不可收拾的结果。在今日透过街头暴力获得政治利益的情势已经出现，但这种策略不允许发生在民主转型的埃及社会中。如果想取得政治权力，则应该透过选票(Ballot)，而非子弹(Bullets)。（注 6）

4.埃及未来发展

前总统穆尔西目前被军方囚禁、其穆斯林兄弟会重要干部遭到逮捕、亲兄弟会的电台遭到查禁。另一方面支持前总统的声援者涌上街头，捍卫前总统民选合法性。现在的埃及趋向两极分化的社会。一派要求军方稳定社会秩序；而另外一方则呼吁释放前总统，给予复职。两者间似乎没有转圜余地。



未来埃及局势不太乐观。Ashour表示埃及最糟情况可能走向1992年阿尔及利亚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后尘。因为内战关系，各造成25万民众丧生。

1992年1月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但没有随即爆发内战。内战全面爆发是在9个月之后。假如埃及军事领导人al-Seesi处置不当，未来将会看到军方与支持前总统的声援者发生武装冲突，到时将对区域与国际关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假如埃及军人集团处置得宜，让伊斯兰主义者回归正常民主程序，停止政治与媒体的打压，拯救埃及民主进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注7）

注1.Alaa Bayoumi, ‘Analysis: Egypt’s faltering economy,’ Al-Jazeera, (15 July 2013).

注2.Ahmed Shihab-Eldin, ‘Egypt’s American-Made Military: More Mistakes than Morsi,’ The Huffington Post, (5 July 2013)

注3.‘Interview with Mohamed Morsi, ‘’We don’t want a theocratic state’’,’ Qantara.de, (24 January 2013)

注4.‘Comparing Egypt’s 1971 constitution to today,’ Al-Jazeera, (9 December 2012)

注5.Alexis Blouet, ‘Sharia: Between the Constitutional and symbolic spheres in Egypt,’ Muftah (26 April 2013)

注6.Omar Ashour, ‘Egypt’s ‘’Spoilers’ threaten democracy’’,’ Brookings, (25 February 2013)

注7.Omar Ashour, ‘Egypt’s new revolution puts democracy in danger,’ The Guardian, (7 July, 2013).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3 托马斯·L·弗里德曼：埃及的“二次革命”



托马斯·L·弗里德曼，新闻工作者，著有《世界是平的》。

“

包容性可以让政府变得步履维艰，也可以带来强大力量，这取决于被包容在其中的各方是否能在未来的发展路线上达成一致。如今的埃及深陷在这样一个经济泥淖之中。该国已经浪费了多年的发展时间。它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包括军方）是否能达成一个民主共识，为了将埃及推上发展轨道而进行一系列痛苦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改革，还是说他们唯一达成一致的只有：最新的这位总统必须下台。

”

看着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埃及政府倒台，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有一天回望这一历史时刻，会不会将它视作“政治伊斯兰”溃退的开始？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一直在读报，也在过去几周走访了土耳其和埃及，这是我观察到的情况：在埃及，我看到非伊斯兰主义中间派和军方对伊斯兰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反抗。在土耳其，我看到当地世俗派城市青年对伊斯兰派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的反抗。在伊朗，我看到一场选举，选民们仅能对六名事先由伊朗宗教领袖批准的候选人进行选择，但他们却很快辨识出，谁是六人中最温和的那个——哈桑·鲁哈尼(Hassan Rowhani)——并帮助他大获全胜。在突尼斯，我看到伊斯兰复兴运动党(Ennahda)在当地选民的压力之下，与两个中间偏右的世俗派政党达成妥协，起草出一部具有广泛基础的宪法，而不过分倾向于伊斯兰教法(Shariah law)。在利比亚，我看到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政治学家所领导的联盟击败了它的伊斯兰派竞争对手，赢下了利比亚第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

不过，要说这一个政治伊斯兰时代已经结束，还为时过早，但现在确实可以说，更温和的、非伊斯兰主义的政治中间派已经逼得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后退，同时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也感到自己享有更大的权力，却正在失去耐心。这种步步逼近在埃及演变成军方推翻民选政府，该事实必然会让我们有所犹豫；这一结果给军方及那些鼓励军方做此决定的人



带来了沉重压力，要求他们与已被取代的那个政府相比，能以更民主的方式行事。但这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局面。一切为何会发生，从这里埃及又会走向何方？

基层民众爆发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驱使埃及军方罢黜了掌权一年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要想理解这种抗议，最好避免用政治语汇来探讨这是军事政变还是群众起义，而应转而关注法律语汇。最近几周与埃及人交流时，有一个词最好地捕捉了该国的情绪，那就是“窃取”。

请不要忘记：穆尔西之所以能在总统选举中以 51%的得票率险胜，是因为他设法说服了许多或世俗派或虔诚的非伊斯兰派埃及人，他在执政时会走中间路线，关注经济，力求包容。只靠基础选民的话，穆斯林兄弟会绝不可能赢得 51%的选票。许多埃及中间派城市精英选择投票给穆尔西的原因是，他们不能说服自己投给他的对手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因为后者是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的残余。就这样，他们说服自己相信了穆尔西的说辞。

渐渐地，事实表明，当面临选择是要包容行事（并从埃及社会的每个部分获取合力）还是攫取更多权力的时候，穆尔西每次都会选后者。一大批为穆尔西投票的选民，不管是不是伊斯兰派，开始感觉受到了欺骗。他们觉得，穆尔西及其政党窃取了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让埃及真正走向民主进程和公平发展的机会。

非伊斯兰派的年轻人发起了 2011 年的解放广场革命，他们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革命果实被穆斯林兄弟会窃取了。比起修复埃及经济和提高政府的代表性，兄弟会变得越来越注重锁定自身和身边的人的权力。与此同时，穆尔西没能信守承诺带来就业和食物，只带来了加油站的长队和断电，这一事实让城乡的贫穷民众气愤不已。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徒自始至终没有信任过穆尔西，他们中有一些人是反穆巴拉克革命的重要拥护者，而穆尔西似乎对针对基督徒的袭击熟视无睹。

正是这种广泛的遭窃情绪让如此众多的埃及人走上街头，因此，穆尔西被推翻前的最后一次讲话显得极具讽刺性。当时，他在总统网站上的一则简短视频里说，“革命果实正从我们手中被窃取。”

这是贼喊捉贼。他的运气不好，喊来了埃及军方。军方领导人本已受到一大批埃及民众的召唤，因此现在被关押起来的反而是穆尔西本人。

历史学者定然会思索，为何穆斯林兄弟会行事如此愚蠢。简单回答，这似乎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兄弟会一直是个类似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有着森严的等级，在多年的地下经历中培养了用以观察政治生活的阴谋论视角。使它能够从埃及军政权 80 年的反复打压和追捕中存活下来的那些品质，不允许它一夕掌权后有任何的包容精神。倒不是说，旧政权及其安



保部门的残余势力没有不遗余力地把穆尔西拖向失败；而是说，他本人让这些人很轻易地就发动了埃及民众来反对他。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旁观者。穆斯林兄弟会为了让华盛顿不加干预，同样采取了穆巴拉克用过的那种贿赂手段：逮捕美国通缉榜上最恶劣的圣战恐怖分子，并且不去骚扰以色列——这样美国人就会让你对自己的人民为所欲为。

目前两个困扰埃及人的关键问题是：再度展示自己才是真正权力掮客的埃及军方，是否会坚持要求新政府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而其目的又是什么呢？除非埃及能推举出一个代表国内所有主要政治力量的政府——这其中仍然会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并且它可能仍会拥有至少 25%选民的支持——埃及的局势永远都不会稳定。它必须成为任何新政府的一部分。但今天埃及军方已经逮捕了许多兄弟会的活动分子。它未来会允许这些人在埃及政坛享有一席之地吗？埃及军方本身有涉及范围广泛的经济利益，并且也一直努力保护这种利益，它会愿意接受任何针对自己的变革吗？

包容性可以让政府变得步履维艰，也可以带来强大力量，这取决于被包容在其中的各方是否能在未来的发展路线上达成一致。如今的埃及深陷在这样一个经济泥淖之中。该国已经浪费了多年的发展时间。它的主要政治参与者（包括军方）是否能达成一个民主共识，为了将埃及推上发展轨道而进行一系列痛苦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改革，还是说他们唯一达成一致的只有：最新的这位总统必须下台。

翻译：曹莉、黄铮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4 何清涟：埃及经验：民主化“所能”与民主化“不能”


何清涟，中国经济社会学者。

> **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近日埃及的军事政变再次将这个古老国度推至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

认识埃及民主化于中国的意义

对埃及这场政变的看法人言人殊，有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民主程序，并担心埃及军方卷土重来，操纵政治；有人则将其称之为“好政变”，因为它符合民意（2200 万人联署要求穆尔西下台），并预测埃及军方将如同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一样，让军队在正确的时候干政，成为国家的守护神，成功后悄然身退。

前一种看法符合民主制度的程序正义，但目前的埃及反对派不可能接受；后一种看法则有点一厢情愿。无论如何，这场政变将埃及拖入了不可知的未来。

中国也在讨论埃及政变。官方媒体纷纷趁机发表批评“西式民主”的文章，新华网发表“埃及局势动荡挖了‘西方民主’墙角”，再次贩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鞋脚论”，其他官媒也纷纷指责民主化是导致埃及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民众不满的主要原因。不少网民相信这种解说；另一些人不相信，认为这是丑化宪政民主，但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

其实，埃及 2011-2013 年间两度发生的政治反对运动，主体都是埃及青年。分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想要之物能否通过民主化立刻得到，以及得到这些东西的可行途径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人们理解埃及发生的一切，比简单地否定或肯定民主化要好得多。

埃及青年要回了权利，却仍然没有工作

2011 年掀翻穆巴拉克宝座的主力军是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今年 4 月底开始的反抗运动，发起者是五位在反对派新闻媒体工作的青年巴德尔、阿布德拉吉兹、沙辛、瓦巴、海卡尔。他们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结为朋友，今年以经济崩盘、国家没尊严、贫民无立锥之地等为诉求，号召连署要求穆尔西下台、提早改选总统。

埃及青年人不满意这位总统其实从大选时期就开始了。青年们多是世俗民主派，他们不满意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穆尔西不得不改变策略，承诺成为全民总统，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以此表达不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的诚意。但穆尔西登上总统宝座后，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埃及经济较穆巴拉克时期更加恶化，失业人口总数多达 350 万，占总人口比例为 13.2%。失业人口中，33%的人有大学文凭，45%的人受过中等学校教育，导致人们对穆尔西的统治日益不满。

埃及人反对穆巴拉克，是因为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们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国家”。但穆尔西执政的一年当中，埃及青年发现他们仍然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更让他们不平的是，新政府里面没有他们的位置。于是，极度失望的青年人一直怀念过去解放广场上的光荣岁月，于是他们再度行动，发起“反叛运动”，有了本文开头的结果。

埃及青年反抗活动家们为何未能参政？

青年反抗者的代表人物 Dalia Ziada 曾将埃及的三股政治力量称之为“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两个魔鬼”分别是掌握很多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军方，以及有 80 余年历史、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个天使”则指怀抱理想主义的青年反对派。

两个“魔鬼”拥有强大的组织资源，而青年反对派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被失业折磨而对现实严重不满，少部分则是出于对民主政治有明确的向往，他们因为“革命”这一价值认同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广场上的短期聚合因其组织者不拥有资源，缺乏组织粘合剂，在革命后很快就会消散。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活动家们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胜出，一是因为他们未能将街头的临时聚合转型为一个成熟的政党组织，二是因为他们缺乏将革命的街头动员转化为政治竞选时的选举动员。革命与民主选举时的社会动员基于完全不同的诉求，革命动员只需要列举独裁者的罪恶并用口号表达理想。但在民主选举中，参选者若要胜选，则必须对大众承诺很多，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承诺，竞选者必须要让大众相信他们有实现承诺的行动能力。这一点正是埃及青年反对派的弱项。如果在临时总统曼苏尔许诺的



以“人民真实的意志”为基础的大选中，青年反对派还是未能完成以上转型，他们的领袖大概也无法通过民主程序在未来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因为民主化只能为所有人提供参与竞选的机会，但并不保证参加广场革命的青年领袖有优先获得权力的可能。

民主化不能直接改善参与者的经济地位

说到民主，中国人眼前浮现的样板一是美国，二是台湾（主要是台湾 90 年代的繁荣景象）。即民主不仅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如普选权、言论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等，还会给人经济保障，许多社会边缘人甚至希望通过民主化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

然而，以上对民主的期望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即民主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穷人与富人在权利上平等；另一半并非事实，一则是因为民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人有工作，二是社会边缘人在民主化后并不能立刻“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让社会边缘人“翻身”的革命只有一种，即彻底颠覆社会秩序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毛式革命让边缘人“翻身”的方式有二：或参加革命，或利用土改成为中共一份子。

埃及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埃及人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情结。埃及人对民主化的向往，主要是认为民主化就可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是，埃及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石油出口、旅游业与劳务出口。埃及人口增长很快，这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水平不足以雇佣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事实上，民主化并不能迅速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加上 2011 年革命为埃及制造了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外部投资者失去信心，大量撤资。占埃及 GDP 约 10%的旅游业也因旅游安全降低而遭受重创，失业现象较穆巴拉克时期更为严重。

社会转型需要成本。持续的“广场革命”只会增加经济改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此情势下，埃及就算再换一届政府，同样可能面临困难，因为经济问题不是民主化就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它既需要领导者的能力，也需要时间，更需要机遇。

2011 年 1 月，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曾说过，革命后离权力最近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是军方，二是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埃及革命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埃及 2013 年发生的一切正好验证当年这一预测。

如果要说埃及民主革命经验于中国人有什么教益的话，我想应该就是弄清楚民主化“所能”与“不能”。民主化能够解决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保证所有人经济上立刻“翻身”。从中国现状出发，将来有幸民主化了，人民得到的也只是各项基本权利，环境污



染、有毒食品等社会失序现象与失业还将长期折磨中国人，因为这些不是通过民主化能够“政治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埃及人还是中国人，只有厘清民主化能够解决什么与不能解决什么，才不会对民主化阵痛后产出的婴儿感到失望并将其抛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评】

9-5 陈婉容：民主路长：埃及政变——不断重复的广场革命


陈婉容，独立记者。

“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

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是谁会想到来得那么快。

埃及有句谚语——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驴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钝的象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头蠢驴，只要重复做也就学会。而埃及学会并不断重复的，似乎是广场革命。两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蔓延至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埃及群众成功推翻了“最后的法老”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年盛夏，开罗解放广场上同样遍地红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点如样摇旗呐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权统治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撵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练好的演出：埃及军方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介入，在最后通牒时限过后罢黜穆尔西，宣布终止新宪法，成立由宪法法院领导的过渡政府。每年大额资助埃及军队的美国也配合演出，对“coup（政变）”一字绝口不提，对埃及人民揭竿起义表示欣赏。

穆尔西坐了总统之位仅一年又三天，纵然有威权统治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权体制统治下逾六十年的挣扎，在一场挟群情而生的军事政变后似乎化诸乌有，军方又向穆尔西的支持者开枪并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种种皆叫人怀疑埃及群众的集体选择：他们想要民主，结果却似乎失去了民主，把军事统治的阴霾带回埃及的土地上。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么？



威权体制的衰落与公民觉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权体制就有所动摇，而穆巴拉克成为最后的法老，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与埃及宪政民主的挣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Anwar Sadat）的“纠偏运动”谈起。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复油藏丰富的西奈半岛后，萨达特在 1974 年颁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销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与外抗衡的偏激经济措施，释放政治犯，撤销新闻审查，废除一党专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为开放的宪政民主国家。兄弟会在此时名义上仍是非法组织，但却开始有民主参与，甚至获准出版党报。然而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伊斯兰激进派同时崛起，兄弟会当中的激进派系在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刺杀了萨达特。继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后随即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法，结社集会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权无限扩张，以至可以毋须经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军事法庭审理。紧急状态法至茉莉花革命后才正式废除，是史上实施最长的戒严令。

穆巴拉克重新实行一党专政，修改宪法容许总统无限次连任，威权体制以更强硬的姿态重临。但萨达特的纠偏政策还是在无声之中松掉了威权统治的螺丝。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扩大了私人领域，也壮大了一群中产阶级，要求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的声音日隆。同时议会选举也成为了这些新阶级固定的政治参与机会，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萨达特时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间回响与有机脉络的政策口号，而是潜伏于威权统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民情的爆发。

换汤不换药的后革命时代

弱势威权主义遇上革命随而瓦解是自然过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权体制国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从殖民时代终结始屹立的威权统治、坐拥大权的军队、重心向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残存的痕迹。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虽是民众的觉醒，是威权体制自身的衰落，却未必是民主派的壮大。埃及的示威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事实：广场上的民众以民主为名，要求坐拥超然权力六十年的军方罢免一个民选总统。就此，美国国际事务学者 Samer Shehata 指出，许多反对阵营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虽笃信少数权利、个人与公民自由；但出于对伊斯兰政党的厌恶，宁可军队挟民意发动政变，也要逼一个民选总统下台。

两年前开罗解放广场上群情汹涌，然而当中的民主派系其实流于松散短视，对民主的理解仅为集会与示威，缺乏长远在民主体制中的执政准备。埃及的 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时广场上的指挥，有庞大的网络动员能力，然而却没有把握机会建立政治势力，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兄弟会穆尔西以仅过半数的



选票胜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而年轻的社运界候选人只获 1%选票。穆尔西虽然曾经尝试整饬军队，一度拥治国实权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坛，但结果只是让军队年轻一代提早接棒，军方势力根本未受打击。一场革命无法消除建制里的旧有势力，达至平等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势力自然只能永远留守广场。埃及民众二度重返解放广场的原因，其实仍与两年前一样，是对于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控诉。

广场政治与公民社会

茉莉花革命之后，广场政治似乎大举复兴，从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广场到开罗解放广场，大型集会与长时间的留守成为了民众不满的出口。然而群众运动的浪漫却不代表坚实的社会愿景，广场的革命情绪对于巩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会令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困局，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从得枪杆子得天下，到得广场得天下，二者性质或有不同，但离成熟的民主一样遥远。

威权体制转型期间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后虽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候选人都只会利用民众对于前政权的厌恶赢取信任，在选战中夸夸其谈，许下无从实现的承诺；选举后因国家最重要的机器仍受旧势力如军队控制而交不出政绩，受群众压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后革命时代完全复制了这种模式。穆尔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军队乘势重新坐大，埃及民众其实是将两年前的成果推倒重来，打开大门容许威权主义重临。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6 张洁平：埃及："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


张洁平，记者

> **革命从来都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更不是来自任何一个群体的设计。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编者按】这里记载的是革命半年过后埃及的一些变化，当人们读到"在解放广场的一切像是一场恋爱，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她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时，或许会对两年后广场上迟迟不愿散去的人多一种理解。然而"解放广场共和国"终究不等于埃及，人们需要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所有的机会和挑战也在这个维度展开。

在探访了一个个革命者的个体后，作者判断：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的黎波里与班加西的枪声终结，卡扎菲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面仿佛电影画面：I will be back！但谁都知道，和本阿里、穆巴拉克一样，这位驰骋北非沙漠数十年的强人，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在了 2011 年。

2011 年冬天，三千万人口的突尼斯在阿拉伯世界播种了一支茉莉花，这场席卷北非、中东的革命由此有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茉莉花革命。这片陆地上的集权政体们在青年人的激情与反抗中面临着半世纪以来最大的动摇。在人民坚持不懈的和平示威中，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然后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利比亚。叙利亚的反政府示威与政府镇压仍然胶着。

即使是在以色列，这个和众多阿拉伯国家势不两立的国家，被西方认为是阿拉伯革命后，构成这一地区最大不稳定因素的犹太教国家，也爆发了三十万人的反政府游行，年轻人打出的标语是：Walk like an Egyptian。

而埃及的年轻人，前一天还习惯性地称呼以色列人为“以色列猪”，后一天就在 facebook 上转发以色列大游行的视频。——这两个宿怨深重、剑拔弩张的国家，一场世俗革命会给它们带来什么？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巴勒斯坦人伊扎特认为，两个地方的变革趋势，最可能左右阿拉伯世界的未来：开罗、大马士革。“阿拉伯之春”是否能够降临，埃及与叙利亚的转型，将是两个最重要的判断指标。

埃及已经在路上。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的这个古老国家，如今被人记住，再不仅仅是因为七千年前的三角锥，而是因为有了二十一世纪的 2.0 式广场革命。如何从街头革命进入到全面转型，如何在宗教、互联网与普世价值之间找到未来政治之路，埃及肩头，停着全世界的目光。

追寻这道目光，记者来到革命之后的埃及——

从开罗机场往市中心的路上，出租车在漫长而闷热的地下隧道堵得一动不动。这是辆八十年代的苏联产 LADA，空调发出沉重的噪音，已经无法让蒸笼一样的气温再下降一点。司机 Ahmed 不以为意，摇下车窗，开大了车里的阿拉伯音乐，挂在后视镜上的埃及国旗卡片轻轻掀动了一下，露出后面几张年轻人的照片。

“他们是谁？”我们和司机东拉西扯，想要分散炎热的注意力。

“哦，他们是解放广场上的烈士。”Ahmed 说：“你们，知道革命吗？”他语调自豪地和我们讲起了半年前发生在埃及的革命。

“埃及人很好，但是埃及政府很坏。”

“我们在解放广场赶走了穆巴拉克。”

“现在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自己了。”

“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因为革命之后游客少了。但是以后一定会好。”

Ahmed 用简单的英语重复着上面的话。埃及国旗和烈士的照片在车里飘荡。这样的场景，在开罗的一个月里，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碰到。

都快要到住地了，Ahmed 才说起金字塔。他塞给我们他的电话，说如果要找便宜的旅馆，要去看金字塔，玩尼罗河，去亚历山大，或者沙姆沙耶赫，都可以打电话给他。这才有一点 Lonely Planet 上介绍的埃及的感觉了——所有人都会向你推销旅游。只不过如今，只要打开了“革命”的话匣子，旅游就可以下一步再谈了。



革命：最完美的情人

这是六月的开罗，想要寻找革命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并不难：这座城市如今每一道缝隙里都填满了国旗的颜色——墙上到处是国旗演绎出的各种涂鸦，路边截断的树桩被涂上红白黑的国旗色，灰秃秃的桥墩也被刷成国旗色，商店的玻璃门上贴着国旗贴纸，住宅楼的窗户里伸出国旗，年轻人胳膊上带着国旗色的护腕，走上广场的姑娘围上国旗当头巾，连卖冰激凌的小店铺墙上，都挂满了烈士和国旗的照片……

在开罗大学教授英美文学的专栏作者 Sonia，身材娇小的美丽女教授，一直悉心关注着这个政权与社会的变化。对于今天开罗遍地国旗的样子，她说，这是从没有过的。

“埃及人并不总像现在这么爱国”，Sonia 说，以前只有埃及国家队赢了足球才能看见国旗，“我觉得对政府的厌恶多多少少也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感情。”Sonia 提到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埃及的移民潮，“许多年轻人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太失望了，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给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发展，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穆巴拉克时代，她参加各种知识分子的时局讨论沙龙，和一批火力十足的作家一起写批判文章，在感受绝望的同时，体会着这个国家四处的暗流涌动。

2011 年 1 月 25 日到 2 月 11 日，她每一天都在解放广场，和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们站在一起，支持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变革。

开罗市中心这一片最大的城市广场，从被改名为“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开始，游行示威、抗议集会，便一直是它历史功能的一部分。六十多年前人们在这里抗议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后来反抗法鲁克王朝，然后悼念纳赛尔总统……但从没有哪一次集会，像 2011 年的广场革命一样，让 Tahrir 从此深植人心。

2011 年 1 月 25 日，百万埃及人走上广场要求改革、清除腐败、要求公民权利、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经历了切断通信、警民对峙、暴力冲突，经历了 847 名普通人的死亡，坚守整整 18 天之后，执政三十年的总统穆巴拉克宣布下台。

纪录片导演 Dawood 在那十八天里拍下了无数画面：穆斯林与基督教并肩而立，穆斯林祷告时，基督徒保护他们，基督徒做礼拜，穆斯林保护他们；女人解开头巾，和男人一起高喊口号；人们在广场上举行婚礼，新郎新娘们在坦克前拍摄婚纱照——那 18 天里，共有 170 场婚礼在解放广场举行。

“许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做一个记录者还是一个参与者。刚开始，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活着离开广场，站在那里，我只感觉我必须首先做一个埃及人，国家需要我站出来。一直到后来，记录的工作才能慢慢多做一点。”Dawood 说。



他慢慢地讲：“在解放广场的一切像是一场恋爱，革命就像一个最完美的情人。她是我生命中最爱的人。”

在一个男人可以合法娶四个老婆的埃及，带着儿子上广场的 Dawood，还真动过娶一个“revolution wife”的念头。“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在广场上认识一个姑娘，然后跟她结婚，加入那广场上的 170 场婚礼，纪念我人生中最动人的这场恋爱。”

“后来……”Dawood 羞涩地笑了：“后来，我老婆就到广场上来找我了。”

Sonia 说，很多人都无法忘怀那一个 18 天的世界。冬天里，挤在帐篷一起取暖的人，不分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所有人站在 Tahrir，只有一个名字：埃及人，只有一个目的：要回属于我们的权利，拿回属于我们的国家。

人们在解放广场完成了一次新的身份认同。这一次，不是伊斯兰，也不是阿拉伯，而是“埃及人”。解放广场凝固成世俗埃及的精神高地。Tahrir 的故事印刷成书本、画册在大街小巷出售，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讨论、演讲一场一场围绕 Tahrir 展开。它被广泛地用来指代革命、理想、新时代，乃至指代一种新生的核心价值：自由、民主、权利、国家认同。

这种价值共识，在独裁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让这个国家重新充满了可能性。

满街都是总统候选人

当然，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确切的未来。

在革命前到访埃及的中国作家许知远说：“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二十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而“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常常是独裁政权匆匆离去，留下最令人遗憾的遗产。埃及是否要经历这样的轮回？全世界都在小心观察。

在一个曾经掌管一切的独裁政权垮台之后，各种力量浮上水面：

第一线的示威者，那些曾经促成了革命的青年活动家们，他们一次次重返广场，从五月二十七日就第一次打出“二次革命”的口号，一遍遍要求迅速审判穆巴拉克和独裁政权的作恶者，责备过渡军政府改革的缓慢，并质疑军政府的诚意和退出权力舞台的决心。在革命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五，示威者们都会聚集在解放广场，有时为了庆祝革命果实，更多的时候，他们希望用这种曾经被证明是成功的方式，继续敦促这个国家朝向民主、自由改变。



在此前的执政党压力下无处施展的反对派政治家们，一夜之间从社会的各个角落涌现到台前，他们参加电视辩论节目、广场演讲、新闻发布会，注册成立自己的政党，甚至宣布参选总统。“到处都是新政党，满街都是总统候选人”的盛况出现在此时的埃及，并不让人意外。

穆巴拉克时代的“主流”公众人物，悄无声息地隐匿了。曾在广场上支持穆巴拉克的演艺明星，或者在官方媒体上诬陷广场上的青年“别有用心”，受到“境外势力”挑唆的作者，他们在革命前后的言论被详细列出来，在 facebook 上疯传。他们如今是民间的“清算”名单，再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话，购买他们的作品。

曾经的执政党 NDP，三千万党员仿佛消失在一夜之间，没有人承认自己曾经是这个党的一份子。在亚历山大，我们遇到建筑师 Bassal，革命之后，他加入了一个为新政党提供咨询服务的年轻组织 NEXT，而曾经是 NDP 党员的身份让他在同事中饱受了一番质疑。“我仍然喜欢穆巴拉克，他是个称职的军人，他没有抛弃他的国家逃走。”在亚历山大的深夜，在热烈地讨论完“政治正确”的革命时，他静静地说：“只是这些话现在不能对外说了，没有人敢说。”

而草根百姓，在结束了夜夜守着电视，看广场上激动人心变化的日子之后，回到柴米油盐和日常工作。他们就像我们遇到的司机 Ahmed、工人 Hetem、导游 Mohamed、书店店员 Mohamed 等人一样，一边为身为“埃及人”而骄傲，一边为了现实生活日渐忧虑。人们希望革命的成果早日显现，可以尽快迎来一个更繁荣、和平的埃及。

六个月前的广场上，军人与青年紧紧靠在一起，每天都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自发地给帐篷里的革命者送水和食物，解放广场上的坦克堆满鲜花——浪漫的热恋终将结束，今天的广场上，革命者与军队之间的冲突暴露了这一点，而普通百姓与革命者之间的罅隙也渐渐浮现。

由最高军事委员会（SCAF）执掌的埃及过渡政府，甚少表露心迹。在广场上，军队曾经违抗穆巴拉克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赢得了埃及民众的热烈支持。但组成过渡政府之后，他们用武力驱散示威者、逮捕抗议者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心存忧虑。

八月十四日，二十六岁的著名活动家、青年组织“四六运动”的领袖之一 Asmaa Mahfouz 被临时政府拘留，罪名是在 Facebook 上“污蔑”最高军事委员会。Asmaa 在 Facebook 的主页上是这样说的：“如果司法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那么即使军队指使暗杀，人们也不会惊讶，因为现在没有法律，没有司法。”Asmaa 后来获得保释。

像 Asmaa 一样的革命者与军队之间的裂痕显然越来越深。同样，Asmaa 们与草根百姓之间也罅隙丛生。



八月，当军队和警察驱逐持续在解放广场上抗议的年轻人时，解放广场附近的许多小店主纷纷叫好。他们希望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意。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场之外的公众，大多数也支持军队“清场”，让埃及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两个魔鬼与一个天使

如果说革命是一场恋爱，直到七月二十九日之前，大多数埃及人还沉浸在蜜月期。

七月二十九日的这个周五，走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不再是年轻人，而是身着白袍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月的埃及“世俗革命”之后，这是解放广场第一次迎来“回归伊斯兰”的主题示威。人们的口号变成：“抬起你的头来，你是穆斯林。”而他们中间的沙拉菲派（SALAFIS，伊斯兰教强硬派别，鼓吹绝对遵守教法，拒绝一切“革新”）则高喊“伊斯兰，伊斯兰，不要世俗化，不要自由化”，甚至有人喊：“奥巴马，奥巴马，我们都是奥萨马（Osama Bin Laden）”。

这一天，埃及著名博客 Dalia Ziada 正在美国与学者和政客们讨论埃及的未来走向。她 29 岁，已经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人权活动家。“在华盛顿的讨论中，学者们在伊斯兰和军政府之间，都选择站在军队这一边”，她写：“人们如此担心中东地区出现第二个‘伊斯兰共和国’。”

她遇到的每一个美国官员、学者、分析人士都跟她说：“这是两个魔鬼，我们了解的那个总比我们不了解的要强！”

但她并不认为西方世界对这件事的理解是正确的。“美国人都相信，埃及要么会走向那个他们知道的魔鬼——独裁的军队，要么会走向那个他们不知的魔鬼——伊斯兰主义；但他们为什么看不见那个天使呢？埃及的变化不同于以往，推翻强大的独裁者的力量，并不来源于军队或者伊斯兰，而是年轻的、非暴力的革命者，和他们对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诉求。”

“我希望华盛顿不要再重复他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为了抑制一个魔鬼而支持另一个。我也希望埃及的天使可以飞出那个让他们感觉安逸的地方——解放广场，向世界证明，埃及可以像推翻独裁者一样，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国家。” Dalia Ziada 说。

许多年来，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想象陷入一个怪圈：为了防止他们走向伊斯兰主义，宁可支持世俗的独裁政权。美国此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支持就如是。

在埃及著名作家阿斯旺尼（Aswany）看来，这也正是许多独裁者精心设计的二选一选择题，竭力渲染本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借外面世界的恐惧，维护自己不可撼动的统治。“穆巴拉克就是这样做的，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只有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巴拉克两个选项。



要民主就要伊斯兰，要世俗就选择独裁。这是完全扭曲的。也是违背事实的。”阿斯旺尼说。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创办人 Peter Ackerman 并不认为埃及会由此走向伊斯兰主义，本拉登一派更早就没有了市场。他说：“事实上，埃及发生的事情在美国海豹特遣队第六小队之前，就已经杀死了本拉登。”

Peter 说的是埃及广场革命中展现的非暴力、自由化、开放的本质，这种新的价值共识，实际上早已大大削弱了本拉登式理论的影响力。

在解放广场上，我们询问了无数年轻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许多人认为拉登是个英雄，或者至少不赖。但认为拉登是英雄的人，绝大多数，反对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

刚从军队退伍的 23 岁小伙子 Mohamed 告诉我们，他认为拉登是英雄，是因为拉登敢于“和美国佬打架”，但这和他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没什么关系：“埃及是一个开放的旅游国家，埃及有百分之十的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伊斯兰主义的国家。我不接受，我的朋友们也不会接受。”

他热爱埃及革命，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觉得革命让年轻人在这个国家抬起头来。“以前我说什么我爸爸都不在意，现在他认真听了。你去餐厅，感觉到餐厅里的人看你的眼光都不一样。他们都知道，是年轻人发动的革命，改变了这个国家。”

但 Mohamed 不再参与后来常在广场上聚集的“二次革命”。“我以前做导游，可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还是希望埃及尽快恢复经济。”他说。

埃及的国民经济百分之七十依赖旅游业，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与动荡令埃及旅游受到长期影响，四月埃及入境游的数量比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八十，这个数字尽管在缓慢好转，比起往年仍有很大差距。

在 Dalia Ziada 看来，如何重建军队、革命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共识，如何重建经济，这才是革命之后的埃及最重要的任务，比伊斯兰主义更令人担忧。

八月十五日，十四个政治团体宣布成立名为“the Egyptian Bloc”的联盟，并以联盟的名义，参加年底将进行的议会选举。这十四个团体包括了老派反对政党华夫脱党、自由埃及党、埃及民主社会党、民主前线、埃及社会主义党、埃及共产党、埃及农民联盟、国家变革协会等等，是左翼、右翼政治团体的大联合。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次左右翼的大联合，是建立共识的一次努力，有利于自由派政治力量在议会选举中，与实力雄厚的穆斯林兄弟会抗衡。

革命之路



革命之后，围绕埃及革命与转型的讨论每一天都在进行。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从革命如何走向转型？在开罗大学、开罗美国大学，全世界各地研究民主转型的学者和活动家，都把目光聚集在埃及的解放广场。

1 月 25 日的革命直接导火索是邻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也有相当程度的偶发因素，如同许多媒体所分析的，带有“自发的”、“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特质，但显然，这并不足以解释穆巴拉克 30 年执政的垮台。

April 6 Youth Movements（四六运动）的发起人 Adel 以自己的经历给出了一个视角。这个 2008 年成立的组织，是引导埃及革命最重要的青年力量之一。

2003 年，Adel 才上高中，当时美国入侵伊拉克，埃及掀起反战游行，人们聚集在解放广场，掀起了埃及二十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游行。人们抗议美国，但第一次有人在游行中喊出反对穆巴拉克的口号——这位统治埃及近三十年的法老式人物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如果说街头需要学习，此后每一年，埃及年轻人都有了学习的机会。

2004 年，在高涨的物价和封闭的政治气氛下，一群社会精英发起了“受够了”（Kefaya）运动，2005 年大选之前，Kefaya 达到高潮。人们发现，统治了二十四年的总统不仅不愿下台，还准备让自己的儿子继任。Adel 印象深刻地记得，那一年，是人们第一次清晰地喊出要“穆巴拉克下台”，“以前人们不敢想象这些，穆巴拉克可是我们的父亲啊……从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Adel 说。

2008 年，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工业城市 El-Mahalla el-Kubra，因为通货膨胀、工资太低，工人宣布在 4 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罢工，罢工的消息引起一群网络活跃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 Adel。埃及的工运近十年来渐成规模，年轻人决定，用互联网帮助他们。

Adel 们建立了一个 Facebook 群组支持工人罢工，一夜之间，就吸引了 7 万人加入。相比他们之前在街头小打小闹的成果，这个迅速增长的人数让他们意识到，状况不同了。这个群组被命名为“四六运动”（April 6），尽管罢工后来走向暴力，并遭到镇压，四六运动的声援也并没有在那一次事件中奏效，但这个组织长期存在了下去，并最终成为点燃 2011 年埃及革命的重要火把。

2009 年夏天，Adel 去了贝尔格莱德，在那里的 CANVAS（Center for Applied Non-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实用非暴力行动与战略中心）的组织参加培训。该中心缘起于九十年代末青年学生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运动。他们用在 CANVAS 学到的经验，把严肃的威权政治，消解在快闪、恶搞等一系列年轻的抗议形态中。“我们在等待一个机会”。

突尼斯革命成功，让积攒了多年的社会愤怒情绪看到一个爆发的可能。



“那些日子有无数的人问我，埃及会不会也迎来一场革命，从老家的乡亲到开罗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Adel 说：“我甚至接到了一位法官的电话，他问，1 月 25 日（埃及的警察日，往年也会有人选择这一天上街抗议）真的会发生点什么吗？我肯定地说：一定会。”

然后发生的事情，已经被铭刻进历史。

站在余温犹在的历史现场，听 23 岁的青年领袖、24 岁的人权律师、27 岁的社团领导人、30 岁的人权活动家讲述他们多年的抗争故事——他们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变革真的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你会清晰地意识到：革命从来都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更不是来自任何一个群体的设计。

在去中心化的时代，“顶层设计”正在变成一种优美但无效的古董，雪藏在博物馆里。真实生活里的革命，是每一个个体选择积累出的结果。

Adel 们努力的每一条轨迹，看似轻浅难以察觉，却都埋下了历史的伏笔。甚至后革命时代的样貌，也已经由这条浮现出的轨迹，逐渐决定了。

后记

在今天车流喧嚣的解放广场，想要忘掉革命的发生，其实也很容易。

比如过马路时，没有人看红绿灯，也没有红绿灯，实在需要视死如归的精神，才能在车流里腹背受敌地穿行。有时候，身旁的埃及人会跟你搭讪：“过马路吗？很简单。站在马路中间，闭上眼睛，相信真主。你就过去啦！”比如海关工作人员会伸手管你要小费；不少人在相谈甚欢后伸手跟你要采访费，狮子大开口的竟然要一万埃镑……山无棱天地合了都不会改变的，只有埃及人的幽默和精明。

尘土滚滚，一切庸常。只是每到晚上，灯光映照下的解放广场，会透出不一样的气质。

夜深了，三三两两的年轻人仍然聚集在广场中心，总有人在高声发表演说，更多的人没有什么事，只是闲坐，聊天。晚晚如此。有些人会穿着印有有革命标志的 T 恤，有些人在胳膊上、额头上画着埃及国旗，大部分人只是和朋友掐成一团，高声调笑。他们讲阿拉伯语，我很难听懂，却总是觉得，来到这里的他们，脸上有一种回家的表情。

Sonia 也感到了这种表情。她说：“埃及是一个世界，Tahrir（解放广场）是另一个世界。许多人都很想念六个月前，Tahrir 的世界。而我们要做的努力，是把这两个世界合二为一。”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7 王林聪：埃及公民社会刍议


王林聪，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

“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作为学术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人们对它的确切定义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更重要的是，这一争议颇多、又有很深西方烙印的“公民社会”术语，如今在非西方国家亦广为流行，且常常被用来分析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与社会发展问题。然而，这种源于西方语境的“公民社会”对于解读非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现象究竟具有何种效用?特别是关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公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议题。本文以埃及作为研究对象，拟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兴起及相关问题

20世纪 90年代初，公民社会研究在埃及逐渐兴起，一些学者尝试用“公民社会”诠释埃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例如，现流亡在外的埃及社会活动家萨德·埃丁·易卜拉欣博士曾任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是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发起人之一，著有《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与社会》、《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改造》和《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前景》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照搬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分析模式，以此评判埃及公民社会，常常抨击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与此同时，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穆斯塔法·赛义德撰写的《埃及的公 民社会》 以及穆海卜·札齐所著《1981年至 1994年的埃及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专门对埃及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公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等。实际上，埃及公民社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乃是埃及社会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始于萨达特时期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社会现实，并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批自治



性和自愿性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包括同业公会（professional syn2-dicates）在内的许多公民社会组织重新恢复了独立活动，并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党制逐渐恢复，允许反对党以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威政权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其次，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自由化波澜，当权者基于增强统治合法性的考虑，推动政治改革，实行选举，鼓励政治参与，甚至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于是，构建公民社会成为当时朝野的一种呼声。1992 年前后，“公民社会”这个对埃及人而言的新概念很快流行开来，吸引了知识界和媒体的注意力。1995 年 6 月，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娜·穆巴拉 克还发起了首届全国性非政府组织会议。学术界在开展公民社会研究的同时，自然地将公民社会与埃及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寻求破解民主化滞后之谜，并且对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充满了期待。

进入 21 世纪以来，有关埃及公民社会的研究便以多种形式展开，专门的公民社会研究机构、期刊等相继创立，各种以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中，自 2003 年以来出版的年度研究报告《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广泛展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公民社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们不再相信欧洲中心论者所宣称的“欧洲创造出来的公民社会不能扎根于伊斯兰社会”的论调。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公民社会在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甚至将根植于血缘、婚姻或部落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看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国内也开始关注该议题，探讨公民社会在中东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或从“非政府组织”（NGO）视角，分析诸如埃及等中东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及其作用。有学者还提出，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尽管它不能直接参与最高权力；也正是这种公民社会的存在，使得伊斯兰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复兴原旨教义的民间运动，以纠正统治者对正道的偏离。还有一些人认为，历史上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等活动，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域。然而，这种笼统地将一切与政府抗衡的力量都归入公共领域，或曰公民社会，显然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在中东历史上，无论是乌里玛阶层，还是苏菲派教团，其内部构成复杂、分化悬殊、差异甚大，既有纯粹的民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同官方联系密切，隶属于权力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社会大分化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的民间组织有着严格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廓清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区分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

公民社会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分化的产物。尽管“公民社会”一词在不同时期其内涵所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按照其基本属性可以将公民社会界定为：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由自愿组织 或自治机构所组成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是自治性和自愿性，在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相对独立性。换言之，公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自愿性团体，是由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自治组织。



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排斥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笼统地将独立于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全部归入“公民社会”。

传统的民间组织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是基于血缘、地缘或族缘、教缘等形式连结在一起的民间机构，其族长、教长主宰着传统社会组织，维护其利益，甚至可以与政府相抗衡，使政府权力难以完全伸入到传统民间社会内部。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内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实行等级制和家长制，强调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和效忠。传统的民间组织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缩小了的政权形态”，它一旦坐大，国家政权就面临解体的风险。一些秘密组织、帮会、宗教极端组织，更具有强制性和破坏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强大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一种消极力量，可能危及政权的生存，导致国家的分裂或衰落。相反，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抑制独裁和专权，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可见，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构成复杂，情况各异，变化多样。随着时代的变化，一些传统社会组织会逐步向公民社会演变。例如传统的自治性宗教慈善组织，其活动已具备公民社会的某些属性，因而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埃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传统社会组织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有时能够同政府相抗衡，但就其组织内部而言仅是一种依附关系，并不具备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例如，埃及社会长期存在大量行会组织，其中以手工业最为明显，诸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等等。不同行业的小作坊结成行会，各行会有自己的行头（谢赫）和行规，其组织形式如同金字塔，顶端是行头，中间是行会会员，学徒处于底层。行会内部是一种封建宗法关系。行头通过推选产生或世代相传。进入 18 世纪后，行头逐渐变成了包税商，凡向政府提前缴纳一定数额税款者，即可取得行头资格。随着埃及近卫军的瓦解，行会组织又多为近卫军士兵及其子孙把持。行头包税商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和本行会成员的利益，而是像农村包税人一样向行会成员进行敲诈勒索。从这些情况看，埃及封建手工业行会还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

伴随着埃及迈入近代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产生，并引起社会分化的加剧，许多 富商充当包买商的角色，或身兼手工工场主，开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出现。开罗等地的商人还组成商会，在埃及社会中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自愿性的民间团体，诸如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地理协会、伊斯兰福利协会、科普特人昌盛协会、埃及工会以及自由职业者同业公会等相继出现，其中，埃及新型政党组织祖国党于 1907 年宣布成立。它们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社会组织，尽管力量弱小，影响有限，但仍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受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和现代组织观念的侵染，一些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在发生转变，有的逐渐向公民社会组织转型。例如，1928 年成立时穆斯林兄弟会是典型的传统民间社会组织。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洗礼之后，目前正在由激进趋向温和，由封闭走向半开放，兼具传统社会民间组织和某些公民社会的特点。尽管这种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但它说明传统社会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19 世纪上半叶，埃及公民社会组织就已经出现，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被看做是最早的公民社会组织。然而，在当时条件下，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缺乏推动力，传统社会力量遏制着公民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公民社会还处于萌芽期。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后，一方面，埃及传统社会力量遭受打击；另一方面，公民社会的正常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和破坏。1922~1952 年君主立宪时期，政治上的多党制和多元化为埃及公民社会发展创造了时机，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乘机发展起来，公民社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此后，在纳赛尔时期一党制单一政体下，政府强化对社会的控制，社会组织受到严格限制，有的被迫停止活动。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埃及政府的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变革，许多社会组织恢复了活动，各种自治、半自治性民间协会相继成立，且日趋活跃，其影响力逐渐扩大。有统计显示，1900 年埃及民间社会组织数量仅为 65 个，1925 年增至 300 个，1960 年有 3195 个，1976 年有 7593 个，1990 年又增至 12832 个，其会员人数达 300 余万。2005 年，民间社会组织已超过 19000 个，2007 年达到 23200 个。从整体规模看，埃及民间社会组织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表明公民社会在埃及取得了初步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的发展，反映了在快速进步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参与等多元化需求，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例如，下层群众对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需求（诸 如住房、健康、教育、食品供应、建清真寺、诊所，关心特殊阶层和妇幼保健等）的不断增长；中等和中上阶层对于文化、职业、政治诉求等方面的愿望，等等。当政府无法及时有效提供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时，数以千计的服务机构、慈善团体、职业协会、妇女组织、文化机构等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同时，伴随着政府推行开明政策，对社会控制程度降低，自由空间的逐步扩大，民间社会组织跨地区、跨境活动日趋增多，大大丰富了公民社会组织，有助于公民社会朝开放、宽容的方向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同业公会、工会、商会以及宗教慈善机构等，其构成成分复杂，大小规模不等，并呈现如下特点：

1、埃及公民社会在生成模式上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又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两种类型兼而有之。其中，政府主导型模式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然，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有的受制于政府，具有明显的依赖性，有些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半独立性。



2、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在观念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 集合体。通常情况下，各公民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社会理想等方面虽各不相同，但以相互尊重和宽容为前提。然而，埃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特别是具有明显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与世俗性组织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截然对立，分歧严重，相互排斥，缺乏宽容。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不同宗教性社会组织（例如，科普特人与穆斯林）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20 世纪 90 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就逐步掌握了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等的领导权，占据了工程师公会中 43 个席位中的 41 个，药剂师公会 12 个席位中的 10 个，医生公会 12 个席位中的 11 个。埃及公民社会中的这种巨大张力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它不仅损害社会发展和稳定，也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3、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水平及规模上具有不平衡性。宗教性组织快速发展是比较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20 世纪 60 年代，伊斯兰民间社会组织占总数的 16% ，70 年代达到总数的 30% ，90 年 已占 43% ；科普特民间社会组织占 9% 。1 同时，即使在从事不同专业的自由职业者团体——同业公会，其规模因行业及从业者人数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规模较大的有 10 万之众，如教师公会（75 万）、 商人公会（31 万）、农艺师公会（25 万）、工程师公会（20 万）、律师公会（15 万）、医生公会（10 万）。数万人以内者如记者公会、体育工作者公会和药剂师公会等。近年来，埃及官方统计显示，在现有 23 000 个民间社会组织中，约 14 600 个在城市，800 个在农村，600 个在沙漠地区。这种分布的不平衡说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标志是其享有充分的自治地位，能够有效维护公民的权益，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同时，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之间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竞争性关系，即充分尊重各自的利益表达和信念；公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和宽容的。从上述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特点来看，埃及公民社会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中，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特征。

公民社会在埃及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既是民主政治得以生成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又是维系和巩固民主制度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充分条件，提出“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化”。然而，具体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甚至是不确定的。对于这种现象，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直截了当地说，在多数穆斯林国家，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信奉自由民主的反



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在穆斯林社会，确实有壮大的公民社会出现，但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从中可以看出公民社会状况在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实际上，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公民社会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因此，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需要谨慎以观，避免简单化。

埃及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究竟如何这实际上取决于公民社会主体状况及其发展条件的变 化。一方面，公民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为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了动力。从 30 多年来埃及社会发 展来看，公民社会组织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特别是同业公会、工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突 出，构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中，同业公会是埃及社会团体中最富有政治气息的 利益集团，尤以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和记者公会影响颇大。同业公会关注民主和自由问 题，要求政府取消“紧急状态法”和一切限制自由的法律，允许自由成立政党和发行报刊，释放政 治犯。同业公会常常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上表达不同的意见。1993 年政府为了遏制伊斯兰主义 势头，颁布了公会选举法，规定选举产生至少要有全国会员大会半数会员参加方能生效，从而使穆斯 林兄弟会控制的公会理事会成为非法。从而引发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举行静坐和游行，指责政府颁 布该法是“背叛民主”和“新的专制”。近年来，律师公会、记者公会还频频向政府施压，要求扩大 自由，推进民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成熟性以及政府的限制，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极其有限。20 世纪 90 年代，有研究者发现，埃及民间组织约占阿拉伯世界（70000 个公民社会 组织）的 1/3 以上，但只有 49% 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和职能是积极和有一定作用的，其余一半则是不 积极的，其作用微乎其微。如今，每年新增民间社会组织数以千计，然而，量的积累并没有达到质的提升，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公民社会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问题依旧突出。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世俗化程度有限，又有权 威政权的控制统治，等等。其中，公民社会主体自身问题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体，但是埃及公民社会主体成分更为复杂（如上所述），各社会组织之间分歧尖锐，斗争激烈，尤其在世俗性社会组织与宗教社会组织之间对垒明显，鸿沟甚巨，价值取向截然相反，难以形成 一种平等、宽容、节制的多元化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半个世纪以来，政教关系话题一直是埃及 社会中的最敏感问题，常常被有意回避，足以说明社会宽容氛围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宗教势力在公 民社会组织中的强势影响无疑增加了人们的疑虑，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控 制，表面上增加了与政府抗衡的砝码，似乎有利于制约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尚 在转型中，并不完全具备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因此，它对于民主化进程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不能排除其以利用公民社会组织为手段，达到控制社会、抗衡政府，最终控制政权的目的。就此而 论，在政

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削弱政府权能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强大的现代公民社会，进而推进民主化；公民社会的壮大只有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能形成与民主化的良性互动。正是基于上述复杂情况，埃及政府既要维护其权威统治，巩固既得利益，实行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又要通过种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力图将公民社会的发展纳入政府管控的轨道。为此，政府颁布了《民间协会和机构法》（1964 年），并于 1999 年和 2002 年两次进行修订。该法规定，民间协会应具有公益性质，民间协会的成立须经社会事务部批准，并受其监督，禁止民间协会参与政治 或宗教争论；禁止成立秘密组织；禁止民间协会在未征得政府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接受国外捐赠或向国外转移资金；协会或组织每年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说明本协会或组织的活动和财务等 情况；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进行募集捐款等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此外，政府还主导成立各类联合会，通过设立专门的扶持基金，控制和引导民间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和公益活动。实际上，政府强化 管制的诸措施，既有遏制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向公民社会渗透的目的，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 民社会的发展。

总之，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当前，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在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思】

9-8 张翠容：私有化的迷思——-从戴卓尔夫人逝世说起



張翠容，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

“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对外资更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但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令到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危机爆发。

”

我们曾经为“阿拉伯之春”兴奋了一阵子，现在可能已把有关国家抛诸脑后。但，革命过后的北非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到现在仍深陷经济泥沼，从经济危机再爆发最新一轮的政治危机，这可能也给了我们一记当头棒喝。借戴卓尔夫人逝世所带动有关戴卓尔主义的讨论，我们是否有必要检讨，在过去全球化的模式下，导致多国社会动荡，究竟哪里出了错？

自上世纪八零年代初，列根与戴卓尔夫人一上台即振臂一呼，共同全力推动利伯维尔场主宰论，这意味必须扫除任何阻碍资本流通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法律规范，环保意识，以至国与国的强界。

这一切体现于对资本流通的去监管化、对经济与非经济产业的私有化、利润的最大化和利得税的最低化，无论是专政或民主国家，都无一不受冲击。

只要看看埃及，一九八一年当穆巴拉克接任，新自由主义也随着列根与戴卓尔夫人上台而正式登上世界舞台。西方关心的不是中东民主，而是希望透过中东的代理人，打开资源丰富的中东市场，主要的手段就是把新自由主义根植于该地区，这即鼓励开放国内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提升资本的流通度等。

到了一九九一年，美国向埃及宽免外债，同时要求穆巴拉克按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建议，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改革税制以吸引私人投资、把公营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

福利等。在寡头政权与美国合力推动的自由经济下，私有化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好为统治阶层和其他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窃取国产的良机。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对外资更完全不设限，没有红利税，并取消投资资本最低要求，外资自由进出。但他们没有在埃及制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又没有令到埃及的贫穷得到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危机爆发。

最近在新闻上，得知 IMF 正与埃及新政府，商讨最新的援助方案。方案不仅要巩固过去的经济结构，而且进一步深化私有化政策，引来连场示威抗议，甚至血腥冲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指出，向全球兜售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推手，正是总部设在美国的 IMF 、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

斯蒂格利茨还说，IMF 在不少地方都反映着，其政策主要跟着美国财政部走，财政部则与美国金融界关系千丝万缕，而后者所关注的是私有化所带来的商机，以及他们能否夺得垄断的地位。

换言之，这种私有化不是按整体社会利益的私有化，而是朝向企业利益垄断的私有化，而自由贸易亦可作如是观。

早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财政部要为国内累积的庞大资本寻求投资管道，他们便透过自由贸易谈判，还有迅速发展的信息科技，来打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令到游资在这些地区流窜，终于导致危机爆发。

从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到九十年代的东亚及东南亚，还有现在北非的埃及与突尼斯，以及欧洲国家，经济危机先后爆发。此时，IMF 便会提出纾困方案，但这不也外乎缩减政府支出、加强私有化等板斧。但，这却引发滞胀，经济不稳。

受援国为求稳定经济，则必须向 IMF 提出更多的借贷，结果造成恶债。至于欧洲国家，政府为救助银行进一步深化主权债务危机。IMF 的所谓救援，反之把许多国家推入恶性循还的陷阱。想不到的是，这种手段竟然也是一种财富大转移，最后转到华尔街去。

美国知名社会科学家兼作家苏珊.佐滋(Susan George)曾批评欧盟跟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走，并大力巩固 IMF 的结构调整政策，也强迫欧洲国家接受 IMF 的救援方案。

佐滋说，欧盟今次要拯救的，乃是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深受危机的欧盟成员国。她哀叹欧盟愈益不民主，里斯本条约便是一例，这是欧盟力抗成员国人民的看法，两番硬闯通过的条约。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的其中一项权力，就是可进一步在成员国之间扩展私有化的领域，打开所有具有经济效益的服务，面向市场竞争，这包括非经济领域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饮用水等。

结果欧洲国家等小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面对欧盟与IMF的所谓救援方案，不得不深化私有化而贱卖国产，究竟最后的得益者是谁？讽刺的是，他们在经济上愈获救援，政治和社会上愈见动荡，此刻欧洲国家竟然与北非国家的命运不谋而合。事实上，英国经济亦每况愈下，戴卓尔主义的后遗症赤裸呈现。英国人最后发现私有化带来的成本效益与上升的生产力，却竟然令价格不降反升，并还要承受多项公共服务削减之苦，扩大经济不公情况。看来，只有跳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幽灵，解构戴卓尔主义或列根经济学的神话，才能为世界危机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9-9 斯蒂芬·马希尔：埃及动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斯蒂芬・马希尔，自由撰稿人。

“

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

”

在埃及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将辞去总统一职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飞抵埃及，对埃及人民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了祝贺。希拉里称，革命者已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可以回到家中，为自己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将扫尾工作留给美国及其埃及同盟军，后者自 1952 年以来便一直统治埃及。为了证明对推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最重要盟友的埃及人民并无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和美国政府，这些坚实地支持了穆巴拉克 30 年的统治并对埃及实行了严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实体，延长了对埃及和突尼斯高达 150 亿美元的援助和信贷以协助其民主过渡。这一慷慨之举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及其与之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机构（IFI）竞相显示出它们对革命者的慷慨和对中东进步的支持？

西方思想体系及其政权在埃及的宣传大体复制了克林顿关于"坏"与"好"的资本主义隐性宗旨：穆巴拉克和他的"腐败"团伙既然已被驱逐，在由美国支持的埃及军队监督的选举中，就可以用好人替代坏人来恢复制度。因此，最近的事件使这一点更加明确，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必将继续其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埃及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但埃及人民面对的仅仅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抑或是体系本身的问题？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否足以满足革命的要求？是否存在更多的变革潜力？在这里，我们不能避免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埃及动荡及其所形成的新现实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关联的？

不管是否意识到，埃及革命者都直面资本的统治。由于害怕结局转变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西方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埃及仍融合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的慷慨"，作为一个手段，形成了对埃及未来有力的影响。通过使埃及负债，以切断埃及信贷的能力，使埃及与外国资本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军队和其资产阶级盟友面对民众动乱时的统治力。在从穆巴拉克统治过渡到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进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表象之下，上述策略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实现这些策略，西方世界及其埃及盟友正试图驱散暴动民众，并压制重塑埃及社会的革命潜力。

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自民族主义领导人纳赛尔 30 年前去世以来，在西方的煽动下，埃及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进程。纳赛尔带领埃及走出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创建出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经济体系。1967 年埃及被以色列击败后，纳赛尔的继任者萨达特在华盛顿的帮助下，于 1978 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为埃及打开了进入美帝国体系的大门。美国对埃及政权的援助迅速增长，而萨达特则启动了其开放政策，开始了埃及的新自由主义转型并且将埃及经济与国际资本绑定，该进程在萨达特于 1981 年遇刺后由穆巴拉克总统加速进行。1982 年至 1990 年的债务危机迫使埃及向"巴黎多国俱乐部"寻求债务重组。作为继续贷款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迫使政府削减了社会服务开支，放松了价格管制，削减了补贴，放开并推进了行业私有化，关注通胀，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这一方案打破了纳赛尔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区域团结，巩固了与全球资本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同时伴随着会使底层阶级蒙受灾难的可能。

这一转变对埃及社会关系影响深远：日益增长的不平等，贫穷，底层社会的不安定，以及对数百万计处境悲惨的人们的排斥。新自由主义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毁坏了埃及的医疗体系、其他社会服务及众多的国有产业并对其进行了私有化。据最近"团结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粮食补贴减少了 50％以上，而频繁的私有化则意味着"较低的工作稳定性、更长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人社会服务标准的降低"；这也是约束劳动力的有效手段。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评级，埃及被列为全球损害劳工权利最严重的 25 个国家之一。形成对比的是，当局的政治盟友却从私有化进程中获益颇多。国有资产在向国内寡头包括陆军军官阶层转移，形成了与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新资本家阶级。通过建立西方金融家可从埃及不断攫取财富的债务周期和不断持续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从埃及劳动者手中攫取的大量盈余在埃及统治阶级及其西方支持者之间被瓜分。

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 1981 年至 200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约为 4 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



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尽管生产和财富都在增加，但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在许多情况下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例如，面临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显性通货膨胀，埃及的最低工资 26 年来一直保持不变，特别是工资品价格。大多数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埃及人平均每周工作 48 小时），而赚取的工资连支付基本生活必需品都不够。雇主不付雇员薪酬的情况并不少见。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让工人申诉不满的制度安排并不存在。除了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埃及工会联合会（ETUF）尽管表面上代表工人，但实际上受控于政府并支持对劳动者和穷人意味着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方案。自 2004 年总理艾哈迈德·纳齐夫和他的改革内阁班子上任后，新自由主义方案被赋予更新的活力，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日益驱使工人反抗统治阶层。

尽管受到埃及工会联合会反对，但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还是开始影响生产：2004 年至 2010 年间，埃及发生了 3000 多起劳工运动。服装和纺织行业首当其冲地受到罢工冲击，建筑、运输、食品加工，甚至开罗地铁系统的工人，也纷纷加入。2007 年，在世界粮食危机中食品价格上涨了 24%，对社会现状激增的愤怒引发了大规模的面包暴动。55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75%）将他们的主要收入花费在食品上，工人阶级的意识开始发生巨变，对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的恐惧被饥饿和绝望取而代之。与政府采用的新自由主义原则相反，国家被迫实行扩大补贴计划，以稳定价格。

可以预见，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对其政策下的牺牲者毫无怜悯。尽管这些措施对底层阶级意味着毁灭性的后果，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坚持把埃及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穆巴拉克的财政部长加利于 2008 年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主席。2009 年 9 月，世界银行称赞埃及第四次成为"世界十大积极改革者"之一。2010 年 2 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埃及经济发表了一个光鲜的报告，宣称其"经济绩效好于预期"，并赞扬政府"审慎的财政管理"。

自前总统萨达特在 1981 年遇刺后，埃及陷入了一种持续的紧急状态，其国家机器"大规模地和经常系统地侵犯劳工权利"。但是尽管被如此镇压，日益普及的新技术还是把社会主义者、网络活动家和工人们联系在一起，于是不断发展的社会运动得以巩固和扩大，这在中东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尽管 2000 年互联网和手机技术还没有在埃及出现，但截止 2009 年已有 20%的埃及人进入互联网，总人口的 70%拥有手机。埃及社会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运动聚集的能量，不断扩展的革命思想开始占据上风。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表达自我的理想通过几乎不受政治控制的博客传播得以实现，在蓬勃发展的工人抵抗运动中，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开罗、马哈利亚或其他城市的街头，常能看见他们的



身影。当以技术为基础的解放潜力逐步释放，不断变化的观念和技术交互作用，就有可能在根本上实现运动的民主组织形式。新技术革命的爆发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而这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直接冲突。新生的城市青年运动和工人的联盟初见端倪。

国家机器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剧了阶级矛盾，当实际工资低于温饱水平时，社会危机爆发了。同时，新技术把那些心怀不满者、被剥削者和被边缘化的人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意识和技术工人不分等级的特征在运动的发展中以一种同属一个阶层但分散化的组织形式显现出来。

同时，当日益强大的工人试图通过罢工和示威给统治阶级和无为独裁的国家机器施加压力时，生产停滞就会经常发生。同样，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因身处国家机器的专制体制结构中而恼火。随着新民主社会运动的每一次胜利，国家机器用以强制维持秩序的恐怖开始崩溃，普遍的授权意识得到增长。

革命：紧张局势和对抗

尽管自 2008 年暴乱后政府提升了价格补贴，但在 2011 年的革命起义中，埃及的食品价格又上升了 30%。这次快速的价格上涨至少部分是由于美联储的决策所致，美国为了实施近 2 万亿美元的货币量化宽松计划，使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不断流动和膨胀的美元价值的资产价格。这意味着日用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并对贫困国家造成了最严厉的打击。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并不能解决它的危机趋势，而只能把这些危机转移出去。在《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一书中，哈维强调，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一壁垒的持久重新配置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继而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域状况下危机形成的多种方式"[1]。为了在 2009 年的危机中稳定系统，西方金融机构只是简单地进行了重新配置：极高的通货膨胀部分引发了蔓延整个中东地区的起义（2009 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一倍）。

突尼斯非暴力革命的胜利导致埃及人进一步的激进，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受到鼓舞，加入到工人中并肩作战，反对政权。1 月 25 日，依靠诸如 Twitter、Youtube 和 Facebook 等技术手段，爆炸性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广为流传，数万人在开罗的解放广场抗议，很快便形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半永久性的群众集会。在解放广场，当一种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出现时，抗议者有效地暂停了国家权力。

这些不分阶层的技术特征体现为暴动以水平的、无领导的组织形式发生，这种组织形式挑战了国家机器的权威结构，既包括直接的非暴力反抗，也包括间接地实施一种模棱两可的、介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之间的社会组织形式。为了压制运动，就要对运



动的技术支持加以控制。1 月 26 日，穆巴拉克政权关闭了许多埃及互联网，并伴随短暂的移动通讯中断。同时，为了证明若没有权威的国家机器，革命模式无法维护社会和谐，政府雇用便衣警察抢劫商店，制造混乱与暴力。

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解放广场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埃及的生产中断、经济停滞。除了旅游收入的蒸发，许多商店和工厂也被迫关闭，包括埃及银行业。三个星期的抗议，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生产的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资产贬值让统治阶级为这次暴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军队敦促人们"回去工作，获得报酬，生活要回归原位"，但大多数生产部门仍处于停滞状态，根据东方汇理银行报告，每天至少损失 310 万美元。

为了平息暴动，经过多次表面的让步，2 月 11 日，奥马尔·苏莱曼（他是可怕的内部安全部队负责人，也是穆巴拉克作为对示威者的让步任命的副总统）宣布，穆巴拉克将下台。但穆巴拉克垮台后不久，工人们在席卷埃及的罢工中清晰地表明，他们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完成，并对在埃及以及国际上的资本发出警告。一位劳工组织者说："我们希望推翻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去。"

未来：承诺和陷阱

持续的劳工行动和资本疯狂可怕的反应清晰地表明，在起义中，示威者挑战的不仅仅是埃及政权，他们也要面对美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旨在维护对区域能源供应的控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控制方。像穆巴拉克这样的地区领导得到支持并被允许为自己积累大量的财富和权力。作为回报，他们同意在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框架内运作，出卖其战略性和经济性利益。美国在埃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一种政权（这种政权会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或实施一种替代方案（即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并可能成为他国的榜样。在埃及，一个阿拉伯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政权的前景一定会震慑西方权力中心。

纳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在《震荡学说》（The Shock Doctrine）一书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经常利用危机（如在 1982 年至 1990 年的埃及债务危机）的优势，把反民主的新自由主义计划强加在"震惊的"和不知情的人们身上。对埃及的拟议贷款和其他援助，总额已高达 150 亿美元，其目的就是在有序过渡的幌子下巩固资本家阶级和军队的权力。尽管国家允许个人自我表达和组建政党，但在表面自由选举实则限制更多的状态下，这些"负责任的"领导人决心继续推进新自由主义计划。事实上，放开贷款的假定前提条件是埃及经济的持续私有化和自由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5 月 26-27 日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报告中所说，埃及的"政府政策应支持一个有利的环境，其中包括使私营部门蓬勃发展"。



根据西方的描述，埃及起义主要是针对少数腐败分子无法正常运作资本主义，因此要求实行"正常"、"民主"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埃及革命是亲市场的。本着这个精心构建的故事，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个价值 10 亿美元的债务交换，其中美国同意，只要埃及愿意按照华盛顿的意愿用钱，就可以减少埃及的债务负担。奥巴马清楚地表明了如下愿望：目标必须是这样一个模式，保护主义让位于自由开放，商贸份额不断上升，繁荣经济，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对民主的支持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上：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推进改革，加入竞争性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2]

债务周期是另一种机制，通过它，国际债权人将埃及与全球资本主义链接，迫使其政府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通过永续债务循环，埃及需要不断获得新的信贷以偿还其长期债务，埃及将竭尽所能来保持新增贷款。这种债务循环导致了从埃及到国际贷款机构的资金外流。2000 年至 2009 年间，埃及长期债务的净转移（收到的贷款和偿还债务之间的差额）达到 34 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埃及的债务增长了 15%，尽管事实上它偿还了总额为 246 亿美元的贷款。这种依赖自我强化的循环，把数十亿美元从埃及的贫困人口重新分配给西方金融家，使这些机构拥有对埃及政府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尽管事实上这笔债务被称为恶债，但却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鼓励。穆巴拉克的核心集团和资本家阶级富达数十亿美元，而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民却深陷极度贫困之中。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保持经济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建立通常所说的"虚拟议会"，是另一种令埃及处于约束中的方式。如果埃及政府不服务于资本利益，西方投资者可以迅速撤出资金，继而抬高利率，摧毁流通货币，使国家财政空虚。无疑，维持自由的资本流动是对埃及新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援助和信贷，因此，埃及工商阶层警告说，持续的革命运动会带来资本外逃的危险。恶兆是，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 Service）下调了对埃及五大银行的评级，这一举动一定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进一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又几乎肯定会提高评级。

综上所述，埃及正处于破产的危机之中，在一批又一批国际银行家面前，埃及过渡政府谋求信贷并再次确保当局仍然会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 5 月 20-21 日欧洲银行主办的"重建和发展"的主题会议（这是在冷战结束后，按照自由市场原则为重建东欧经济举办的，带有灾难性后果）上，埃及过渡政府代表宣布："目前的过渡政府将继续承诺市场开放，埃及将进一步加速迎接即将到来的大选。"[3]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都做出相似的声明，承诺援助和支持。

军方任命的埃及领导人已明确表示，这些不只是空头支票。为了确保这种持续的资金流和巩固国内阶级的力量，过渡政府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工人罢工，强行打压抗议活动，努力遣



散劳工，并辅以分裂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联盟。埃及资本家阶级及其国际盟友希望颁布温和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平息城市运动，及早预防更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赴埃及代表团团长与穆巴拉克任命的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经过多次秘密谈判，达成了 30 亿美元的贷款，其表面上是支持"社会正义"，背后则可能隐藏着一种担忧，即埃及起义将明确转为反资本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小规模的变革，如微调最低工资，借此希望安抚城市运动，并将其与工人相隔离，维护资本家阶级的霸权和美国支持的军队。事实上，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由于大多数埃及人工作在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只是"换汤不换药"，不太可能实质性地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分化工人和城市青年运动：在开罗的示威游行和持续的劳资纠纷的巨大压力下，政府突然宣布，它将拒绝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所有贷款。

但是斗争仍在继续。由于抗议和劳工行动持续席卷埃及，政府宣布，为了满足国际市场，将致力于减少赤字，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尽管如此，全国总罢工仍然迫使执政的军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上涨达 6 倍，同时大量新组建的独立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各地涌现。持续的不满也迫使临时政府总理沙拉夫承诺内阁改组。但是，哈齐姆·贝卜拉维——一位 74 岁的经济学老教授，曾参与了广受诟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这再次激起公愤。事实上，贝卜拉维先生已宣布，他将考虑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而拒绝修订由他的前任、穆巴拉克时期的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提出的广受非难的预算。解放广场上的革命者和工厂工人共同谴责拉德万的预算，因为它无视为社会公正而革命的要求。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持续增加对埃及军事统治者的巨额援助，埃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是继续作为美国全球帝国和跨国资本的附庸，还是绘制出一条更加独立的路线。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违背美国的意愿，着手旨在改善数以百万计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变革。埃及是成为中东第一个开辟新道路的国家，还是仍然做全球资本主义帝国的附庸，仍有待观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宗洁、冯自强

设计：潘雯怡、邓晓君、张宇星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